

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
首都师范大学中国诗歌研究中心 主办

中国诗歌研究

动态

第七辑

• 新诗卷 •



学苑出版社

责任编辑：刘 丰
封面设计：徐徐书装



ISBN 978-7-5077-3517-8



9 787507 735178 >

定价：85.00元

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
首都师范大学中国诗歌研究中心 主办

中国诗歌研究动态

第七辑·新诗卷

学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中国诗歌研究动态. 第7辑, 新诗卷 / 赵敏俐主编. —北京:
学苑出版社, 2010.3

ISBN 978-7-5077-3517-8

I. ①中… II. ①赵… III. ①新诗—文学研究—中国
IV. ①I207.2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0) 第 042661 号

出 版 人: 孟 白

责任编辑: 刘 丰

出版发行: 学苑出版社

社 址: 北京市丰台区南方庄2号院1号楼 100079

网 址: www.book001.com

电子邮箱: xueyuan@public.bta.net.cn

邮购电话: 010-67674055

销售电话: 010-67675512, 67678944, 67601101 (邮购)

印 刷 厂: 北京东君印刷有限公司

开本尺寸: 710×1020 1/16 开本

印 张: 27

字 数: 420 千字

版 次: 2010 年 4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0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85.00 元

编 委 会

主 编：赵敏俐

执行主编：孙晓娅 张桃洲

编 委：（按姓氏笔画为序）

王光明 王兆鹏 方 铭 左东岭

刘福春 李昌集 吴伏生 吴思敬

吴相洲 林 莽 施议对 钟振振

钱志熙 徐 炼 黄卓越 蒋 寅

蔡 毅

目录

[青年学者沙龙]

- “不告别”：文本的社会性及其可能 1

[论文索引与摘要]

- 2008 年新诗研究论文索引 11
2008 年新诗研究论文摘要 72
2008 年新诗研究硕士、博士论文摘要 91

[诗集与诗学论著叙录]

- 新诗著作叙录（2007 补遗） 刘福春 \114
新诗著作叙录（2008） 刘福春 \124

[研究综述]

- 新时期废名诗歌研究述评 尚文祥 王泽龙 \189
朱英诞研究综述 马正铎 \200
袁可嘉研究综述 芮逸敏 \208

[专题·追忆袁可嘉]

- 告慰袁可嘉 李景端 \220
青山绿水，皆我故乡
——追思诗人翻译家袁可嘉先生 蒋洪新 \222

悼念袁可嘉先生的一封信	王圣思\225
我所接触到的袁可嘉先生	蓝棣之\238
斯人可嘉	北 塔\242
暮霭里盏盏灯火唤归家	王素蓉\248
敬悼袁可嘉先生	张曼仪\253

[专题·诗学对话]

秋日里的镜子与“玩线木偶”	
——阿毛访谈录	霍俊明\255
在场的游离与专注	
——沈奇访谈录	胡 亮\266

[书 评]

新锐取向与学理深度的融汇	
——评罗振亚的《20世纪中国先锋诗潮》	宋宝伟\282
歌词研究的理论体系	
——试论陆正兰《歌词学》的学术史意义	李淦林\288
流派研究对个体特征的遮蔽	
——从《陈敬容诗文集》说起	段从学\298
为历史作证：评李润霞编“潜在诗选”	罗振亚 邵 波\303
批评的激情、难度与深度	
——评《尴尬的一代》	王 永\311
新诗的自由和声律	
——读郭成华《新诗声律初探》	陈 亮\317

[学术会议与活动]

中法诗人座谈会综述	卢 娟\322
-----------------	---------

- “诗歌与社会”学术研讨会综述……………常丽洁\325
- 诗心常青春，乡情永不泯
- 台湾诗人向明访首都师范大学中国诗歌研究中心记 胥 岩\332
- 星回于天
- 《灰娃的诗》研讨会综述……………李润霞\336
- 美国诗人阿法在首师大中国诗歌研究中心座谈述要…王士强\359
- 一份“70后”诗歌的研究个案
- 郜蓓诗歌创作研讨会综述……………秦 俐\362
- 在与天近的地方倾听神的声音
- 第二届青海湖国际诗歌节八月上旬在西宁召开 李之平\370
- 新诗重“立”轻“破”的“建设时代”来临
- 21世纪中国现代诗第五届研讨会暨“现代诗创作研究技法”
- 学术研讨会综述……………王珂 陈卫\372
- 江非诗歌创作学术研讨会在海南召开……………霍俊明\383
- 纪念一座沉寂的洪钟
- 袁可嘉诗歌创作与理论研讨会综述……………龙扬志\386
- 第二届中坤国际诗歌奖颁奖典礼在京隆重举行……………坤 新\395
- [纪 事]
- 2008年新诗纪事……………李润霞 薛媛元\397

“不告别”：文本的社会性及其可能^①

◇ 参加：张洁宇、段从学、姜涛、冷霜、孙晓姪、张桃洲

◇ 时间：2009年9—11月

张桃洲：各位，这次讨论的起因，是前一阵姜涛在电子邮件里发来的一篇文章，题目叫《巴枯宁的手》，由他对萧开愚一首短诗《下雨》的阅读入手，谈到了整个现代诗的境遇、语言的可能性的反思、诗与历史语境的张力以及新诗研究的活力等诸多问题。里面有些问题我觉得很有必要拿出来一起讨论。这篇文章篇幅较长，还是先请姜涛概述一下这篇文章的情况吧。

姜涛：好的。作为“改革开放”的历史产物之一，当代诗是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化而被边缘化的，但换一个角度来说，它又是这段繁荣历史的受益者。最初，作为“抗议文化”出现的写作，天然具有意识形态的合理性，为了寻找自己的身世，为了使这个身世更具英雄色彩同时也更洋气，诗人和批评家们也一直在努力，不断追溯起当代诗可能的资源。从20世纪30—40年代现代诗有限的努力，到“文革”时期“地下的写作”，到黄皮书代表的阅读特权，再到一连串西方大师的名录，自80年代开始，诗人们吞咽着各种稀奇古怪的知识和传统，以形成自己秘密的营养系统。从效果上看，这种广泛的涉猎以及对伟大“谱系”的发明，的确使当代诗在具有历史合理性的同时，又具有了美学的正确性。然而，主动追忆也就是一种主动的遗忘，上述知识从总体上看，或许构成了一种“告别”的知识，与20世纪中国社会主义的历史告别，与革命时代的思维方式和感受方式告别。在整个社会喜气洋洋的转型中，这种告别显得激情饱满又耐人寻味。

在告别之后，那个自觉成年的诗歌主体，虽然还戴着苦闷的面具，但感觉其实还不错。渐渐地，语言的自信滋生出了自满，在各种朗诵会与酒会上，都能见到它的身影，它的名字也出现在选本和课堂上，它

^① 因姜涛在日本讲学，这次讨论采用了网络交流的方式。

的“告别式”与“成人式”甚至被写进了文学史里，成为稳定常识的一部分。政权的合法性依赖经济的稳定增长，各种流行的批判哲学和娱乐哲学，又乐于拆除各种各样的关联和纽带。渐渐地，它的傲慢与孤僻被推崇风格多样性的时代容忍以至欣赏，它与周遭一切的反思性关联，也因日久年深而逐渐失去了弹性。在这种氛围中，《下雨》在我阅读中引起的震动，或许与某种“不告别”的状态相关。一方面，诗人的“看”发生于现代诗歌无奈的历史位置之上；另一方面，它又似乎保有了社会主义时代甚至前社会主义时代文字生活的政治性。这种“不告别”多少有点怀旧色彩，但绝不是感伤兮兮的，而是暴露了某种挥之不去的记忆的在场，它不仅在场，而且仍潜在地支配了自我的意识。巴枯宁与克鲁泡特金两个名字的前后对峙，就像一柄铁钳，紧紧地夹住了这首诗，也强化了意识深处的结构：不是从他人那里赎回自我（当代诗歌的基本主题之一），而恰恰是在一种“加入”意识中获得自我更生的勇气。在这个意义上，“不告别”恰恰不是怀旧的，而是指向了一种挣脱当下的可能，一种重建主体的可能，无政府主义的记忆提供了这种结构，它唤醒了诗歌语言内部沉睡的政治性。正如接通了密布于历史深处的电网，这首短诗一下子从它的 90 年代里挣脱出来，一气呵成，迂回盘曲，又张力弥漫。

克服现代社会的分化，恢复文本与行动、知识与实践之间的关联，曾是 20 世纪诸多革命文化和先锋艺术的伟大构想。这种构想不仅体现在激进的口号之中，它还依托于一系列具体的社会运动和政党政治，而达成的前提，则是某种实践性主体的重塑。如今，当整体性的社会运动失之阙如，在一个“去政治化”的年代、一个文化公共性全面萎缩的年代，诗歌可能的政治性，或许仍与街头的、网络的、环保的、维权的、救灾的、扶贫的事件或行为相关，但从根本上说，诗歌乃至文学的处境已根本不同了，历史的“风景化”成为更突出的当代宿命。如果不清醒地认识到这一点，一味想恢复革命年代的实践功能，在动机上或许令人尊敬，但并不能真正改变语言与历史的分裂，结果可能倒是进一步复制，强化了这种分裂。从某种“妥协性”的角度看，诗歌能否唤醒潜在的政治性，还是要寄托于对自身位置及历史脉络的沉思上，诗歌社会场域的重构，不仅要考虑写作的外部功能，它同时也应在写作内部发生。它必须提供一种关于文学生活的全新理解，必须有能力置身于当代精神生活的危机之中，而不只是一如既往地陷入伦理与美学的习见冲突。在

这个意义上,《下雨》这首短诗,它的魅力恰恰在于体现出了某种挣扎而不能的结构。从自我审视的角度,那只伸出的巴枯宁的手,或许正因为是概念性的,才能形成一种真实的“加入”或参与。

张桃洲:我个人觉得这篇文章除了讨论的问题十分重要外,讨论问题的方式也很值得重视。其讨论的问题及方式延续了姜涛近几年一贯思考的东西(比如关于“开放本体”的反思、对《全装修》的解读),其中对新诗研究与诗歌写作共同的新的范式的呼唤,尤其值得关注。不过,我认为萧开愚的这首诗仍然有鲜明的90年代文化背景,比如某种“怀旧”——特别是他当时身处的大上海式的怀旧,这使我想起了史书美提到的20世纪20—30年代现代主义对殖民地中国的书写,其间混杂着种种无意识和姑且称之为现代的元素。考虑到这首诗产生于经过所谓“后现代”淘洗后的普遍的反思现代性的氛围中,它包含的“潜”政治意识和“不告别”姿态是否为一种自觉,尚有待进一步讨论。诗歌与政治的关系这一议题的确需要重新检讨,这篇文章结尾开启了一个很好的方向。

姜涛:其实这篇文章到底要表达什么,我自己也不是很清楚,只觉得如果没有一些新的历史观和前提,无论诗歌研究还是写作都会面临严重疲软的问题。正好今年有很多周年纪念,各种变化又聚集到一起,头脑有点不安静。你提的问题很准,其实我是拿这首诗说事,处理时有些随意,很多判断难免武断,可能是拿了萧开愚后来的态度去看他以前的东西。

段从学:我觉得姜涛这篇文章谈的其实是另一个问题,那就是主体和历史在当代诗歌文本中的位置和可能性问题。此一问题关系甚大,涉及对90年代诗歌的重新审视,桃洲的敏感是正确的。姜涛的思考,估计现在已经能够引起一部分人的重视了。90年代诗人自以为从历史中赎回了自己,但历史并没有放开利维坦的巨手,现在我们已经可以感受到。姜涛的思考确实有方向性的意义。如果能展开,当可以在90年代之外展开新的诗学领域,把被遮蔽了的历史诉求重新浮现出来。我个人深受90年代诗歌之蔽,在这里算是领会了姜涛对90年代诗歌之“反动性”的批评,意义重大。

姜涛:当代诗的困境是显然的,这也是当代文化普遍困境的一个表现,缺乏结构,没有焦点,大家都精神涣散,才去弄弄规则、材料、理论,搞出些学术面目。重建主体,对于诗歌而言,关键还是重建自

己，不做扭捏嘟囔的小文人、装神弄鬼的新式天才，而是真的读书思考、了解世道人情，有所关切。但这似乎是中国诗歌难走的路，冯至所说的五四时期的人道主义之路，我倒觉得其实大可挖掘发扬。

段从学：姜涛谈论的是“当代诗”，一种有别于被审美化、经典化了卞之琳式的“现代诗”，也有别于“90年代诗歌”的“当代诗”。还有一点，就是他谈论问题的话语空间也变了，超出了一般意义上的“诗学”话语空间。用他自己的话来说就是他的谈论，发生在不同的框架中，诸如“美学的正确性”、“诗歌语言内部沉睡的政治性”等精心别致的术语，一再提醒我们这一点。

姜涛花了很大的篇幅，来述说自己对卞之琳式的“现代诗”以及“90年代诗歌”的批判。这些意见，他平时多次说过，但这次有了正面的诗学抱负作为参照，就比较容易看清楚问题所在了。桃洲说姜涛最后敞开了诗与政治的关系问题，严格说来还不够准确。在姜涛看来，问题不是发生在分别被规约为“诗”和“政治”的两种社会文化形态之间，而是发生在诗歌内部，发生在语言内部。唤醒“诗歌语言内部沉睡的政治性”，这个说法非常精确，也很能说明问题之所在。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姜涛认为这是一个新批评或者审美话语意义上的“内部”问题。他对“90年代诗歌”的批评，很大程度上就是为了向这种“内部”话语告别，把“作为一种文化实践的当代诗”和“靠了惯性在语言可能性中滑翔”的写作的可能性神话区别开来。在我的印象中，臧棣是最早把90年代以来的新诗命名为一种探寻写作之可能性的先锋诗歌，由此开启了90年代诗歌的合法性叙述。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可以说姜涛对“90年代诗歌”的批评，带有自我清理、自我批判的意思。姜涛所说的“诗歌”，乃是一种植根于具体的社会场域之中，并且和中国的社会历史保持着主体真实的“触着”的文化实践活动，而不是一种静态的旁观和欣赏的艺术作品，也不是一种发生在诗人的自我意识内部的不及物行为和“内心的争吵”活动。但是，这种实践活动的积极的及物性质，也就是其“触着”历史的性质，又是通过写作行为，在诗歌语言内部完成的。具体说，就是通过写作中的主体重建过程完成的。这里当然有个前提条件，那就是诗人自己要有改变自己、加入历史的愿望，“巴枯宁的手”也才能够从诗歌语言内部伸出来，邀请你进入文本，进入历史，使诗歌写作成为一种积极的文化实践。

张洁宇：诗歌与现实、诗歌与政治、诗人与他的时代……这些都

不是新鲜的话题了，但自问为什么我会觉得姜涛的讨论有新意，是因为这里有具体的思想、立场，有他个人的东西，我觉得这一点非常重要。文章从萧开愚的诗谈起，明显带有借题发挥的意思，所以，是否在他的阐释里赋予了原诗未必自觉的东西以自觉，我觉得那是另一个问题。我同意桃洲的说法，那首诗里的一些姿态其实是不自觉的，但就像姜涛说，一首短诗装不下太多的历史，同样它可能也承载不了姜涛所提出的一个重大的思想问题。所以，这无关紧要，我们都知道它只是一个“引子”。

我觉得姜涛的讨论事实上已经溢出了诗歌之外，它讨论的不仅是诗歌的写法和诗人的立场，它其实涉及了更广泛的方面，同时，它反映出姜涛本人一种强烈的关怀。我觉得这个讨论让我首先从情感的层面觉得被感染，也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姜涛这种讨论的出发点和论说方式。从讨论“中国新诗的发生”到这篇文章，姜涛的研究在很大程度上一直是建立在对自身困惑的解决的出发点上的，这些“问题”与他的学术研究相关，与他对文学史的关怀相关，同时也与他自己的写作相关。不管是从追问新诗的发生来企图追问诗的特征和边界，还是从诗歌与政治的关系出发，去讨论作为一个诗人加入到当代文化实践和当代历史中去的可能与途径，我觉得姜涛的学术面孔背后有一种很明显的个人问题的介入。这种介入，在我看来，构成了一个鲜活的学术研究的真正的血肉。我——首先从情感的层面上——非常赞赏这种立场，同时也认同这种方法。因为我觉得包括学术研究在内，如果不也是要“有意愿且有能力‘加入’”到现代中国的历史当中去的话，而且，如果不也是在研究的内部来完成和实践的话，我看不出那样的研究究竟有什么意义。

说这些可能有点走题，而且太过感性，但这真是我非常想说的话。从自己的问题出发，从当下的问题出发，去讨论文学和历史，我觉得这是现当代文学真正能够吸引人、感染人和有意义的一个基础。

冷霜：姜涛这篇文章从萧开愚的《下雨》谈起，讨论了包括新诗史上诗人的主体位置、早期新文学与无政府主义思潮、诗歌的政治性等一系列相关联的问题，通过对一首诗的解读，既为我们勾勒出一条深长的新诗史的线索，又显示出针对当代诗歌的极具洞见的批评意识，读后深受启发。这里想就诗歌的社会政治关切和诗歌的政治性的问题谈谈我的看法。

近年来，中国当代社会的转型给普通人带来的压力感和焦虑感在

加剧，身处其中的当代诗人也不能幸免，由此在诗歌写作中也表现出一些新的变化，诗歌中的社会政治关切较之于 20 世纪 90 年代要显著得多。在 20 世纪 90 年代渐成主流的注重叙事性的诗歌，虽然强调对复杂现实的包容，其背后的诗学依据仍然是现代主义的，追求“意识最大化”和“综合的心智”的一路，对于现实政治，则采取自由主义的、疏离和反讽的立场，也很少以具体的事件为题材。但这些年的情况有所不同，越来越多的以重大社会事件为题材的诗歌涌现出来，在去年的汶川特大地震时达到顶峰。这种对现实社会的关切是中国诗人悠久的传统，是写作者良知的真诚流露，不过，即使在诗人群体内部，也有对此类诗歌的诸多批评，如诗歌不应将自身降格为新闻的形象化抒写等。我感兴趣的是这类诗在艺术表现层面的问题，很多诗已经从现代主义的书写模式中脱离出来，但是似乎又缺少依傍，向左翼诗歌的传统靠拢吗？可是对后者又已经很陌生了，而且对后者也仍需要转化创新。艺术上普遍的粗糙和陈腐表面上是由于时间距离太短，缺少涵咏和锤炼，深层则是艺术资源上的困境。

这只是问题的一个方面，更深层的是诗歌的政治性的问题。正如姜涛文中所言，诗歌的政治性不单是一个题材的问题，它涉及“怎样看待诗歌的位置，怎样重构它的社会场域，怎样置身于现代中国的历史当中思考语言的可能性，怎样在‘成人’的仪式之后仍保持主体真实‘触着’的问题”，它需要诗人将自身的写作以及与之相关的各种机制置于反思的境地，在对当代诗歌所处的社会场域的自觉中重新建立起一种写作的针对性，从而更新写作的语言并激发出写作的活力。从这个意义上来看，不少表现出对当下社会事件的关切的诗歌恰恰是“去政治化”的，所诉诸的更多是表面化的“政治正确”。也是在这个意义上，写作者只有经由对诗歌的政治性的自觉，才可能重新连通文本的内与外，而在艺术表现层面达成真正的创造力。

《下雨》这首短诗放在 20 世纪 90 年代的诗歌语境中，的确有其不同凡响之处，这一点姜涛的文章分析得已很透彻。不过，今天来看，它似乎仍然属于萧开愚所说的“现代诗”的脉络，而与他追求的“当代诗”有所不同，在 20 世纪 90 年代后期，萧开愚这所苏州河边的二层木楼，远赴柏林，写作上也呈现出新的变化。“现代诗”的起点始于现代中国知识分子的社会、政治与文化关切，力图以现代汉语为前提的诗歌语言承载、传达民族国家现代化的伟愿，强调“当代诗”，也许是在某

种诗歌现代性的书写方案已经体制化、经典化时，试图再次追踪那“不断重临的起点”的表现吧。这是我的一点疑问。

张洁宇：姜涛的讨论其实并不是对于“诗歌与政治”究竟是一种什么样的关系的表态。因为那样一种表态或是说明是没有什么太大的意义的。诗歌当然和政治相关。事实上，那些超然的“看”同样是政治性的，或者说，是有政治立场和姿态的。就像姜涛在文章中分析的那样，是在某些历史时期和处境中的某一类知识分子的一种选择。所以，重要的不是讨论诗歌需要不需要与政治相关，而是诗歌应该与怎样的政治立场相关，这才更有意义。我觉得这样一来，这个问题才能变得具体，而不是笼统的、空洞的、怎么说都对的东西。姜涛的观点表达得比较温和（至少看起来是这样），但是——如果我不是误解的话——他骨子里其实是很强硬、很坚决的。我对姜涛的东西读得不全，就我所见，这似乎是他最坚决的一篇文章。

除了表达了他自己之外，我觉得这篇文章里有一种严肃的——甚至是严厉的——批评，是对当前不少写作者的批评。他在文章后面提出的问题很明确，“作为一种文化实践的当代诗”，应该“有意愿且有能力‘加入’”到现代中国的历史当中去，而且重要的是，这种加入，并不是在题材上的关注和相关，而是要“在写作内部完成”。怎样完成，这是一个大问题。这个观点倒并不是姜涛的发明，但这种话说出来很容易流于空洞。中国现代知识分子当中有这种加入历史的思想传统，现在很多人对此仍满怀敬意。我想，姜涛这个时候提出这个问题，是隐含着一个判断的，就是认为现在的写作——其实应该不仅是诗歌写作吧——在很大程度上丧失了这种意愿和能力，尤其丧失了有效地加入——在写作内部完成——的意愿和能力了。姜涛的提醒和批评，当然也就是对这种意愿和能力的一种呼唤。

我觉得，“意愿”和“能力”的确是他使用得很准确的两个词。也就是说，首先是要不要加入当下的历史，其次的问题是，怎么才能有效地真正地加入。这当然不是很简单就可以回答得了的问题，但至少姜涛的文章里有一部分答案。

我想说的是，在姜涛的文章里谈到20世纪30年代京派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政治姿态，这个姿态影响到他们的文学风格。我觉得这个讨论非常有意思，好像老段也在他的文章里做出过类似的思考，当然二者之间还是有很大不同的，包括侧重的问题和最后的判断等等。我觉

得，他们这种思路是非常有价值的，它一方面可以将现代文学的历史与当下的写作真正贯通起来，在一些连续性的和比较性的思考中，获得新的思想的出发点；同时，它从一个新的角度“解放”了已有的文学史，带来了新的思想。对于已有的一些程式性的研究思路，它发出了有力的质疑。在我看来，这种讨论刚刚开头，其实还大有值得进一步充分讨论和反省的空间。

我说姜涛的文章里有严肃的批评，也包括了对“京派”等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姿态的这种反省和批评。他把20世纪90年代与30年代的某些历史处境和思潮相比较，这是我非常认同的。他的批评的意思也很明确，他说：“无论怎样，在芜杂流变的历史当中，诗歌的想象作为一种造型与抽象的能力，总是能脱颖而出，又将一切作为‘风景’容纳。诗人的身份也从先知、情种、斗士或莽汉，一次次校正为智者。他在忍耐与观察中可以进行超越性的思考、获取内省的存在深度，通过心智的成熟，来消化、对抗外部世界。中国现代诗可能的道路，也就此告一段落。”这段话的确是严厉的，它同时指向了我们当下有关现代诗的研究。当我们所有的研究者也都认同于“智性化”、“玄学化”的标准，并将之视为一种唯一的可能性或是最高的成就的时候，我们也许是缺少了一种批评性的反省。

当然，中国新诗对于玄学性的追求，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是一种有创造力的东西。它在安置了诗人无处可以安置的自我的同时，也赋予了中国新诗一种新的美学可能。而且，这种“超然”背后当然隐含着另一种政治态度，而不是非政治的态度，这是姜涛也强调了。所以问题应该更在于，如果我们今天仍将这种玄学的追求视为唯一或最高，那么，有问题的是我们，而不是那个已经成为历史的知识分子群体。现在很多研究者不愿意谈文学里的思想，文学里的政治，只热衷于谈审美，谈技术，谈语言，把“纯诗”的标准进行到底，我觉得这似乎是有缺欠的。不是说不能谈这些，而是说不能只谈这些。我想，姜涛的文章里也是有这样的意思的。

段从学：诗歌和政治的关系，一直是中国新诗无法回避，但一直没有获得什么建设性的积极意义的话题。从来就没有人否定诗歌与政治的关系，也没有人天真地相信诗歌能够在实体意义不包含政治元素。那些反对诗歌与政治的关系的言说，严格说来，只是反对诗歌与政治的某一种特定关系，某一种发生关联的特定模式，如此而已。把政治当作诗

歌之外，比诗歌更高一个等级的文化实践，要求诗歌臣服于政治，并遵奉政治文化实践的逻辑，乃至具体指令的模式，无论在历史实践中还是在学理上，都已被彻底颠覆。尽管在某些力量和事件的刺激下，这种政治的诗歌形式表达，还在沿着惯性继续滑动，甚至有可能形成所谓热潮，但从根本上说却已经不能为新诗的发展提供动力，也丧失了把自己和作为一种职业要求的新闻媒体世界中的维权活动区别开来的能力。反过来，以封闭自足的语言世界和审美话语为立足点，虽然颠倒了诗歌和政治的价值等级秩序，但同样和前者一样，把诗歌当作政治之外的存在，把诗人自己放置在了历史之外。有了诗歌／政治、内部／外部的先在预设，接受政治和拒绝政治，不过是硬币的两面，完全可以根据诗人自己的需要出牌。因为牌局虽然看起来不是诗人自己开的，但规则却是诗人自己定的，怎么玩都开心。话语精英和极权制度，完全可以在相互对抗和指斥的两个极端，构成一个压迫性的稳定结构，挤压甚至完全排斥其他形式的文化实践，把不同的声音放逐到社会无意识领域之外。诗人拒绝政治的抗议性姿态，一方面展示给极权政治实践，一方面又可以从进行话语操纵的普罗大众身上索取丰厚的回报。

姜涛要求的是一种理想型的写作实践，在诗歌写作的过程中，在语言内部完成诗人的自我救赎，自我建构，以此作为植入历史内部的有效形式。这种福柯式的后现代写作伦理，从学理上说当然是没有问题的。但正如后现代不是一种知识，一种分析对象，而是一种真实的生活态度一样，姜涛要求的也不是静态的诗学观念的确立，而是一种积极的写作实践。在这个意义上，姜涛这篇文字，更像是一位优秀诗人的自我陈述，自我期待。当然，也是一种召唤，对愿意加入历史，同时也有能力加入历史的写作者的召唤。

孙晓娅：确实，我们一直努力而认真地在寻找这样有意义的话题，一个能将我们都围拢起来的话题。当我们还在关注诗歌研究的问题意识、历史意识、主体意识的时候，姜涛借由对《下雨》文本的解析向我们敞开了问题意识的背景、历史意识的真实问题持续问题、主体意识的自我辩驳剥离的问题、知识场的多重关怀与探入问题，甚至引发了现代性伦理对诗歌和历史的延宕问题，当代诗歌从现代诗歌那里延续下来甚至有所“变异”的“纵横开阖的张力”问题，还多次将“诗歌对社会场域的构建”（冷霜语）与诗人对知识场域的重组结合起来。由上可知，姜涛的最终表达在我们的讨论中已经明显变得不重要了，亦如巴枯宁的